

臺灣作家司馬桑敦的韩国叙述

— 後殖民文本尝试与民族主体性的摸索 —

藤田梨那*

目次

- 序
- 一、 司马桑敦的韩民族体验与韩人题材创作
- 二、 从後殖民角度解读《高丽狼》(1) 地理上、政治 的周边性
- 三、 从後殖民角度解读《高丽狼》(2) 作品中《阿里朗》恋歌的象征性
- 四、 从六十年代派 游记看“後 民” 国
- 五、 司马桑敦的韩国叙述 当今意义

序

司马桑敦无疑是属于台湾文学史的，但他与其他外省人一样，终生不能摆脱怀乡与流离的命运。他一生履历了几个生活区域：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日本、美国。正如陈芳明指出的那样，“放逐与流亡是台湾文学中永恒的主题。”¹⁾又正像赛义德说的那样：“亡命使知识人变成与来自于权力、故乡——内在——存在的种种安慰无缘的周边存在”，但“流亡者有两个视点：过去留下的和现在存在的双重透视点。”²⁾司马文学的主题也是以放逐与流亡为中心的。从积极的意义来看，这样的迁徙生活反而使他接触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丰富了他的思考，使他具有了赛义德说的那种双重透视

* 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教授，rfujita@kokushikan.ac.jp

1) 陈芳明「百年来台湾文学与台湾风格」《中外文学》第23卷9期 1995年。

2) 《知识分子论》P98 Edward W.Said大桥洋一译 平凡社 引用文笔者译。

视点。除了上述国家与地区外，他还注视过的地区就是韩半岛。60年代他曾两次访问韩国，作品中也书写过韩半岛。50年代，60年代正是台湾国民党独裁统治最残酷的时期，与胡适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一脉相通的司马桑敦在难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情况下，对韩半岛寄予了极大的关心。他对韩半岛的书写与他对台湾政治趋势的洞察有著密切的关联，也与他的民族主体性认识有著密切的关联。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司马研究的论文。³⁾但对司马与韩半岛的关系还无人涉及。本论文将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司马的韩半岛叙述上，通过对小说《高丽狼》与他的韩国游记的分析，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作品，探索这些作品做为後殖民文本的意义，并探索他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多元性认识的问题及民族主体性认识的问题。

一、司馬桑敦的韓民族體驗與韓人題材創作

司马桑敦，本名王光逖，1918年出生在辽宁省金县。他与朝鲜人的接触及对朝鲜这个国家(战後的北朝鲜与韩国)的体验与关心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是少年时代，抗日时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後的游击队经验。1932年司马14岁时投奔了嫩江地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当了少年兵，参加过几次游击战。⁴⁾有关这个时期司马的行踪除了周励的简单的记述外，目前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了解，更谈不到了解他与朝鲜方面的关系了。但是我们从一些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史料可以旁侧了解司马在30年代所处的环境。

有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我们从杨松的《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⁵⁾中可以得到一些知识。杨松总结“九·一八”事变後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的特点，第一点就指出它是“自发的全民族抗日解放运动”。他说：“当时东北工人、农民、学生、教员、商人及一部分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弟都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自卫军和救国

3) 目前有：周励《火一样的青春——记我父亲王光逖在东北沦陷後的抗日活动》(2001年)、《台湾作家司马桑敦和他的「野马传」》(2005年)、《司马桑敦的短篇小说的乡土特色》(2006)；应凤凰《作家群与50年代台湾文学史》(1999年)；藤田梨那《台湾作家司马桑敦与日本》(2005)、《暴力与人性的对峙》(2006)等。

4) 周励《火一样的青春——记我父亲王光逖在东北沦陷後的抗日活动》

5) 《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解放》第34期 1938年。

军等等，都纷纷起来打日本，保护家乡。”⁶⁾杨松的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他触及到游击队中的朝鲜人：“在第二军王德泰部内，差不多有一半是朝鲜人，就民族历史、风俗、习惯等等来说，同中国人大有区别，但是，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民族独立总的政治目标下，终究能够团结起来，并已组织起朝鲜人的独立军，到朝鲜内地去游击，唤醒朝鲜民众上，已收到相当的效果。”⁷⁾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东北的抗日运动是“全民族”性的，里边有汉人，也有众多的朝鲜人。朝鲜人中有在东北土生土长的，也有“日韩合并”及“三·一独立运动”後逃亡到东北来的。因此不难想像，司马在抗日义勇军中渡过的几年中与朝鲜人接触或目睹他们的行动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与他们是战友，是同志。他的小说《高丽狼》就根据了这个时期的体验。

第二期是1950年韩战时期。此时他已在台湾，任海军官校政治教官。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抗争和冷战的开端，司马并没有涉足韩半岛，但对韩战的局势却非常注目。在他，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想像韩半岛的时期。日後他在访韩游记「滔滔汉江水西流」「战场风腥板门店」「雨蒙蒙，釜山街头」⁸⁾中回忆了战时的情景。当他看到汉江大桥时不禁吐出了12年前的感慨：“车过汉江大桥，看到了旧桥桥基才让我感到十二年前那场残酷的战争。我又重新回忆起那幅可怕的图画：破坏了的汉江大桥上面，挂满了成千上万受难的韩国人民。在当时，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自由，唯一的寄托就在这座受伤了的桥了。”⁹⁾对韩战的如此鲜明的记忆证明司马当时非常关心韩半岛的情形，他通过报刊上的报导、图片已深切地感受到那场战争的残酷。

他对釜山也有一番感怀，他说：“老实说，釜山，这个对自由世界贡献过它的坚强的堡垒作用的城，是我很早就向往一看的历史名城。1950年8月中旬，联军和韩军只剩下这最後一个堡垒，假若釜山也沦陷了的话，大韩民国和联军支持下的所谓自由世界，究将如何写下这段历史，这是颇饶兴趣的，没有釜山，真可以说也就没有了韩国。”¹⁰⁾司马对釜山、汉城的记忆都与韩战紧密联结在一起，而且通过韩战，他对韩半岛的认识从反抗日本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的层面发展到关注东西对立的局势，思考自由世界之未来的广大层面。

6) 《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p5。

7) 同上 p7。

8) 收《爱荷华秋深了》尔雅出版社 1977年。

9) 《爱荷华秋深了》p135。

10) 《爱荷华秋深了》p198。

第三期是1963年、1964年两次访韩时期。当时司马已以《联合报》特派记者的身分长期旅居日本。1963年11月司马随中国记者团应韩国军人执政团的邀请，访问韩国，观察军人执政团革命後第一次民主选举。访问期间他了解了李承晚、朴正熙的政治观点的不同，采访了朴正熙当局的选举会场和“四月革命”暴发地塔公园。还采访了朴正熙的政治对手尹潽善。通过采访，他开始警惕韩国的军人独裁政治的发展。除了政治采访外，司马还观察了韩国的文化、历史、经济生产、韩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性格、感情表现等。1964年8月他又随张群特使再次访韩。这次访问中，他着重调查了韩国的学生运动，他深入到学生、大学教授、媒体工作者、一般民众中，了解民众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不满，感受到韩国民众有争取民主自由的力量和勇气。在第二次访韩中他还有机会去了他向往已久的釜山，参拜了联军战士公墓。两次访韩使他深入地、切实地了解了韩国，他写下了9篇走访纪录，文中提示了他所关注的政治、文化的问题，特别对处在後殖民状态下的国度与民族将如何重构自己的主体性的问题上，以韩国为一个显著的实例，为台湾和其他後殖民国家提出了重要的启示。

从历史阶段来看，上面三个时期正是抱括韩半岛在内的亚洲诸国从被殖民到独立，以及独立後次第进入後殖民的时代。通过上面列举的三个时期，我们可以知道，在司马人生的几乎三分之二的时期内都有过与韩半岛及朝鲜人的接触和关注。特别是他担任《联合报》政治记者後，在他眼里，韩半岛更是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区域。他的所有涉及韩半岛的作品都作于韩战之後，《高丽狼》的发表是在1955年，已是东西冷战开始之後；韩国游记涉及的是60年代的韩国民主主义运动。因此他的作品必然地都与从殖民到後殖民过渡的历史现实有著密切的关联，反应著他的时代认识。这是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忽略的问题。

二、從後殖民角度解讀《高麗狼》(1) 地理上、政治上的周邊性

《高丽狼》(1955年)描写活跃在长白山中的一个游击队首领——一个朝鲜人的故事。这篇作品与其他“韩人题材作品”有所不同。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结束，几乎所有描写朝鲜的作品，比如20世纪10、20年代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

绿江上》，台静农的《我的邻居》，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问世的夏鞏生的《船月》《回归天堂》，都以日本统治朝鲜为背景，描写朝鲜人民的悲苦、反抗、牺牲。这些作品成为目前韩国学者们最注目的所谓“韩人题材小说”。学术界的关心同时也界定了“韩人题材小说”的基本性质。而与这些主流性的“韩人题材小说”相比，歌颂朝鲜人反抗日本，或描写朝鲜人流离失所悲惨命运却没有成为《高丽狼》的主题，使它显得颇有逊色，所以至今还没有人把它做为“韩人题材小说”研究过，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怀疑它是否可以算作“韩人题材小说”。

《高丽狼》被主流性的“韩人题材小说”摒至周边，其实主要原因在于它在时间与主题的设置上与以往的“韩人题材小说”有所不同，它显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以我们以往的论述方法和视角是不能进入它的深层意义中去的。只有当我们用後殖民文学的视角来分析这篇小说时，才可以辨认出它的与众不同的特质来。

《高丽狼》的时间设定在日本战败後，国共内战的时期。即帝国统治的中心崩溃後，本土势力与周边势力的崛起、交错、相互抗衡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的设置暗示著《高丽狼》要描写的是帝国“中心”崩溃後的周边性的抬头。“「中心」的消亡导致对复合体的妥当性的确认。在失去「中心」的世界中，周边性便成为建构现实的重要因素。人种、性别、心理的「正常性」、地理或社会的距离、政治上的排除等，所有周边化的言说在此交错，解消中心与周边的地理区分，构成聚集复交错、混合经验的现实认识。”¹¹⁾这是《逆写帝国》中分析新西兰作家Janet Frame的作品边缘性问题时所提示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也可以运用到《高丽狼》的分析上。这篇小说将地点设在中国东北的长白山原始密林中，日本战败後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主要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角力抗争，他们开始收编东北地区的游击队、绿林组织，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力图形成新的势力中心。登场人物高丽狼与黄老人、‘我’、小宫分别体现了他们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的周边性和中心性。

(一)、地理上的周边性

《高丽狼》开首第一句便是：“一走进黄松甸子车站，我的嗅觉就似乎闻到了狼的

11) 《逆写帝国》，日语版 《後殖民文学》p.187, 木村茂雄译, 青土社 引用中文笔者译。

气息。”¹²⁾黄松甸子位于长白山东北部，是日本统治时期伐木工开发出来的小山镇，又是通往长白山心脏部的重要孔道。高丽狼的武装势力范围就是抱括黄松甸子、额穆索的长白山一带地区。长白山地区与朝鲜一样，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地理上属于周边区域；另一方面，从中国大陆的中原地区来看，它亦是属于周边的。这篇作品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地理上的周边区域，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

除了高丽狼的部队外，还有一个以黄老人为首领的绿林组织也盘踞在黄松甸子。‘我’则来自重庆‘中央’、小宫来自海参威。‘我’本来也在长白山打游击，是高丽狼的好朋友。但十年前离开长白山，到重庆搞抗日活动，日本战败後，‘我’受‘中央’的派遣来收编高丽狼的武装力量。《高丽狼》中地理上的周边性主要通过‘我’对长白山所感到的隔绝感和疏远感强调出来的。当‘我’回到阔别十年的黄松甸子时，不由地将这个原始山林与‘中央’作了一个对比：

我离开黄松甸子已经有十年了，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使我触目尽都是一片陌生。

这一夜，(中略)使我温习起几乎被我忘掉的那些共同困守在原始森林内的相同於动物间的温情。虽然，这些年间政治生活上的教养，使我变得娇弱了，退婴了，對於这些未加磨琢的感情，感到有些粗糙，但是，出自一种诚挚的安堵，却占有了我的思想，我和这些人的交谈，自然的便消散了另一种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猜疑和忧虑的情感。

我意识到在自然中锻炼出来的人物，能和自然同样坚强的。而我远离自然太久了。我默默的观察到自己软弱了。¹³⁾

長白山是屬於原始的，在那里生活的人是堅強的。他們的情感“相同於動物”般的溫暖，與城市社會的“猜疑和憂慮”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是“周邊”與“中心”的具體對照。當時延安共產黨總部的作戰重點是：奪取城市，占領工礦區，截斷鐵路線，控制交通要道，徹底殲滅敵人。1945年日本投降前後八路軍已配合蘇聯紅軍解放和掌握了東北主要城市和農村。但是他們還沒有涉足長白山原始密林，那里便成爲綠林組織、游擊隊、山賊們盤踞的地盤。在作品中作者幾次稱長白山爲“原始森林”，其意在于強調長白山的周邊性。在這長白

12) 《山洪爆发的时候》，p127 司马桑敦 爱眉文艺出版社 1960年。

13) 《山洪爆发的时候》p128~p134。

山原始密林里盤踞著朝鮮族武裝力量。朝鮮族從中國的角度看自然是少數民族；從韓半島的角度看，在過去的被侵略被統治的漫長歷史中大量的朝鮮人流亡到中國東北地區，成為流亡人種聚集的地區。所以高麗狼和他的部隊里的朝鮮人在體現地理上的周邊性的同時還體現了政治上的周邊性。

(二)、政治上的周边性

《高丽狼》的主要情节是游击队首领高丽狼与国民党和共产党、苏联红军的较量。其中穿插了高丽狼与朝鲜姑娘‘仙女’的爱情故事。‘我’代表国民党、小宫代表共产党，他们帶著收编地方武装力量的任务来找高丽狼，‘我’和小宫本来都与高丽狼同在一个游击队，彼此是好朋友，但他们再次见面时各自的立场不同了，以前的朋友现在成了敌人，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在他们各自揣测不安的时候，又有十八个苏联红军突然来到高丽狼的寨子里。高丽狼、‘我’、小宫、苏联红军，这正象征了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局势。在长白山原始密林中四局对峙，展开了一场复杂的角力争执。高丽狼对这些政治对手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高丽狼与我的较量是通过以下的对话展开的：

高丽狼：干什麼都可以，只要自由自在，我们自己认为顺气就行。

我：除了自己，你已经不再考虑革命？

高丽狼：什麼革命？自己就是革命。还有比解放自己，为寻求自己的自由，更革命的事吗？

我：难道，你不再考虑许多人民和你的国家？

高丽狼：你怎麼说的这样抽象？你能把自己和人民分开吗？你会说我自己不是人民吗？你要把我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吗？

我：当然，我不打算把你和国家对立起来，不过单是你自己不能代表国家的！

高丽狼：相反，我以为我就代表国家！

高丽狼：我的全世界就是她，我的全灵魂就是她，除了她，我没有别的！¹⁴⁾

14) 《山洪暴发的时候》p145。。

‘我’和高丽狼围绕著革命、自由、国家争论，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为什麼不能一致？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自由、国家的意思和角度不同，‘我’是站在‘中央’的立场，从掌握整个中国的角度看问题的，‘我’所说的国家指中国。而高丽狼却是站在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他所说的国家并不指中国，而是他的民族。这就反应了高丽狼的主体性意识。他最後说他为了保护他的夫人‘仙女’而不愿交出自己的力量。但实际上‘仙女’是一个象征，她象征著高丽狼的“全世界”“全灵魂”。我们不能忽略‘仙女’所象征的世界其实就是朝鲜恋歌《阿里朗》所暗示的世界。这里表现的是在长白密林中政治方面的“中心”与“周边”的对立，从民族角度看，又是汉韩的对峙。有关《阿里朗》象征性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节讨论。‘我’面对高丽狼的表白显得很困惑：

我为他如此坚强肯定的语气，吃了一惊。我们都无言，我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语词可以支持他，但我也无从反对他，其实，我等于刚刚发掘了他灵魂深处所埋藏的东西，他的爱竟是如此的顽固而执著，我是如此惊讶，因而为之一时莫知所措。¹⁵⁾

‘我’的心理明显地表现出与高丽狼的隔绝，同时又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即‘我’对高丽狼的认同，使高丽狼的地位与‘我’平等。这实际上是对周边性的强调与认同。

高丽狼对小宫，开始也是以朋友相待的，但他也没有接受小宫的收编，在苏联红军强奸了‘仙女’後，高丽狼一气之下把小宫枪毙了。对苏联红军的士兵，开始高丽狼特意宴请他们，‘仙女’也来陪宴，但喝醉了的苏军士兵们竟合夥强奸了‘仙女’，高丽狼不忍看‘仙女’被糟蹋，一排子弹打死了所有的苏军士兵，也打死了挟在里边的‘仙女’。从那以後高丽狼开始烧杀整个额穆索，破坏苏军火车运行的铁路，到此，高丽狼对‘我’、小宫以至苏联红军完全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1945年以後，国共双方都积极开始收编和接收东北的武装部队，‘我’和小宫正是代表了当时国共两方的政治力量，而活动在深山密林中的游击队、绿林部队都是国共双方力求收编的周边力量。高丽狼与他们的对立表明了日本帝国的中心崩溃後，周边力量的抬头，以及周边力量拒绝接受任何企图构成新的主流力量的收编和压制。《高丽狼》的收尾部分描写高丽狼的疯狂状态：

15) 《山洪暴发的时候》p145。

狼的兽性继续高度的发作起来。我目睹著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寨子，同时，也烧了整个额穆索。清晨的昏暗中，许多老百姓，从火中惊醒，哭嚎著来往奔走，而狼却嗜情纵声大笑。

狼可怕的疯了!(中略) 他对于一切遭遇在手下的生物，一律格杀无论。(中略) 咆哮著：「我要干掉一切！一切！」¹⁶⁾

恐怕在评价《高丽狼》文学价值时上面所举的部分是最难估价的。高丽狼因‘仙女’的死而兽性大发，如此疯狂无忌，这对于主人公形象塑造上不能不承认是很不利的。作者司马桑敦也在《山洪暴发的时候》序文中说道：“假若有人问我，在这七篇短篇小说之中，我自己比较最中意的是那一篇的话，我该指出，我曾对「高丽狼」寄过很大希望的，可惜我未把它描写成功。”¹⁷⁾他所说的描写上的未成功或许是指这一部分。即为了保护‘仙女’而拒绝收编的行为和那以後烧杀百姓的行为，作者并没有处理好这两个行为的内在关联的问题。致使作品欠缺了它必要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主题上出现分散的现象。

从“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作者试图体现以前的“中心”解体後，处在政治边缘地区的无秩序，在无秩序中确认“周边性”的强化。作者曾身经国共内战，目睹武装势力间的混战和人民生活的混乱、悲惨。¹⁸⁾他试图通过创作揭露未被写出的历史。正象陈芳明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们这样看世界，无非是受到主流文化或霸权论述的影响。”¹⁹⁾

《高丽狼》作于韩战之後，正是司马桑敦密切关注韩半岛的第二期。韩半岛受著共产社会和自由社会的主宰，被南北割断，成为东西冷战的象征。这个事实自然会给司马带来深切的反思。他的问题意识已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转移到联结整个亚洲和世界，反抗霸权，争取民族自由的范围。

16) 《山洪暴发的时候》p148。

17) 《山洪暴发的时候》p3。

18) 参看《野马传》及自序。司马桑敦文星书店。

19) 陈芳明，《後殖民台湾》，p10 麦田出版社，2002年。

二、從後殖民角度解讀《高麗狼》(2) 作品中《阿里朗》戀歌的象征性

《高麗狼》中，游击队首领高麗狼无疑是异民族存在的主要人物，但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朝鲜人在作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是所有游击队员都倾慕的‘仙女’，又是高麗狼的老婆。‘仙女’是一位非常美丽的朝鲜女子，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

她的美丽惊倒了我们游击队整队的人，几乎立刻我们便共同赠送给她一个‘仙女’的绰号。(中略) 我们把她尊为女神，尤其是狼，素以情感淡泊著称的，竟也在她唱完了他们高丽的乡音‘阿里朗’恋歌之後，大大的动了感情，流了很多次眼泪。狼立刻便爱上了她。²⁰⁾

必须注意的是，所有的人倾慕于‘仙女’是因为她表面的美，而高麗狼的倾心则是因为听了她唱的高丽乡音《阿里朗》，他为这首歌流了很多次眼泪，这表示的是怎样的意义呢？作品中两次提到这首歌，歌词用了高丽乡音韩语的表音：

阿里朗，阿里朗，
阿里朗约！
阿里朗勾夏萎，恼麻干达，
那鲁巴里勾，夏西嫩甯姆恩！
……。²¹⁾

作者在文中对这首歌没有作解释，而是在作品後面加上了注解。就是说作者故意将韩语的《阿里朗》引进作品中，构成一个朝鲜人独有的空间。‘我’与‘仙女’之间本来也有恋情，但‘我’最终不能突进朝鲜人的空间。

《阿里朗》是朝鲜最有代表性的民歌，不仅朝鲜人谁都会唱，就是在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也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但这首歌的诞生却体现了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悲惨历史。宫冢利雄在他的《阿里朗的诞生》²²⁾一书中，披露了他对《阿里朗》调查的

20) 《山洪暴发的时候》p135。

21) 《山洪暴发的时候》p143。

22) 《阿里朗的誕生》，宮塚利雄，創智社，1995年。

详细资料和历史。据他的调查,《阿里朗》本来是李朝末期的劳动歌,1869年重建景福宫时大批的农民被动员参加营造工程,在艰苦的劳动中,劳工们编了这首歌来鼓励自己。以後朝鲜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阿里朗》歌曲,曲调和歌词都有所不同。但《阿里朗》真正成为代表朝鲜命运的歌曲是在1926年罗云奎主演的电影《阿里朗》上映之後。当时朝鲜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都受到日本的统治,所有文艺作品都要受到日本总督府的严格检查。这部电影巧妙地潜过日方的检查,在汉城上映。上映之後,人气暴发,人们都争先恐後地跑去观看,特别是主题歌《阿里朗》扇动了所有观众的心,以致在电影院里,全体观众一起合唱。而且这首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朝鲜半岛。

1927年京城广播电台的开设,1928年日本哥伦比亚唱盘公司开始录制朝鲜歌曲,1931年日语歌《阿里朗》唱片首次上市,即媒体传播在朝鲜的发展促进了《阿里朗》歌曲的海外传播。在日本出现了很多日本式的《阿里朗》流行歌曲,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也十分流行。这些流行歌的歌词都不相同,意思也多有变动。但将《高丽狼》中的《阿里朗》歌词与这些流行歌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歌词与这些後来流行的歌曲不同,而与电影《阿里朗》的主题歌相近。试将二者并列如下:

《高丽狼》後面的注解:

阿里朗,阿里朗
越过阿里朗的岭,
你的脚就会疼起来,
因为你是负心的薄幸人儿!

电影《阿里朗》的主题歌:

阿里朗,阿里朗,阿里朗哟!
越过阿里朗的岭,
弃了我而去的你,
走不到一里路你的脚就会疼起来。²³⁾

《阿里朗》的意义是怎样的?宫冢利雄在他的著作结尾引用了庆熙大学徐延范教授的意见回答了这个问题。“民谣「阿里朗」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唤醒朝鲜民族魂,点燃朝鲜民族的心灯的歌曲。(中略)‘丢掉我而去的你’的‘我’暗示著祖国,人民。丢掉祖国,人民而去的人,‘走不到一里路,脚就会疼起来。’这是表示爱国心高扬的内容。”²⁴⁾做为劳动歌的《阿里朗》在日本帝国的残酷统治下逐渐转变成象征民族的苦难和悲哀的歌曲,在日统时代用韩语唱《阿里朗》时,所有韩半岛的人民都会感受到这首歌所表达的意

23) 《阿里朗的诞生》, p49.

24) 《阿里朗的诞生》, p336-p337. 引用文笔者译。

味，都会沈浸在同一个文化氛围和民族感情中，而统治者却无法进入，所以在残酷的帝国统治下，《阿里朗》仍是朝鲜人民可以享受的自我表达的空间。高丽狼为这首歌流了很多次眼泪，这绝不是因为感于歌声的优美，而是因为他沈浸在朝鲜人独有的感情空间里，与这首歌所表达的民族感情强烈共鸣。

司马桑敦对朝鲜民歌《阿里朗》一直是很重视的，满洲国时代他在东北生活，自然会耳熟于这首歌。直到1963年去韩国访问，他还谈到这首歌。他在访韩游记《青云阁上霓裳舞》中谈到韩国的流行歌，他说：“韩国自家的流行歌，再没有比「阿里朗恋歌」和「凤仙花之歌」出名了。这两支歌都是女低音唱的，曲调幽沈哀伤，如诉如泣。有位韩国文学家曾评价这两支歌与韩国人民被压迫的历史相关，据说，《阿里朗恋歌》是反应李朝末叶被迫劳役的农民的歌子，歌诗情节像中国的「孟姜女」。”²⁵⁾这里虽然没有指明李朝以後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但在“这两支歌与韩国人民被压迫的历史相关”一句话中就已暗示了受日本统治的历史。

朝鲜民歌《阿里朗》在《高丽狼》中出现了两次，两个场面，这两个场面与这首歌的象征意义有著密切的关联。第一次是十年前，‘我’和高丽狼一起在原始密林里初次遇到‘仙女’的时候，“我们是在桦甸浑发河下游遇见的。(中略)尤其是狼，(中略)竟也在她唱完了他们高丽的乡音《阿里朗》恋歌之後，大大的动了感情，流了很多次眼泪。”²⁶⁾他们第一次遇见‘仙女’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听她唱《阿里朗》恋歌的时候。这个时期正是抗日时期，《阿里朗》恋歌正象电影《阿里朗》一样，象征了被殖民统治的朝鲜，反应了朝鲜人民的悲哀和反日感情。

第二次是日本投降後，‘我’来访高丽狼，偶然一队苏联红军也巡逻来到高丽狼的阵营，晚上高丽狼宴请这些苏联红军，在席上‘仙女’唱了《阿里朗》恋歌，但她的美丽的歌声却引来了巨大的不幸。苏联红军兴奋之余竟一拥而上，把‘仙女’强奸了。最後苏联红军连同‘仙女’都被高丽狼打死了。高丽狼的疯狂烧杀也就由此开始。很明显，《阿里朗》在这里暗示了悲剧的开始。考虑到这部作品的写作时期，再联系到作品中的时代、苏军的暴行，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测，第二次的《阿里朗》象征了日本投降後接踵而至的韩战给韩半岛带来的命运。正象徐延范教授指出的，《阿里朗》中的‘我’象征了朝鲜国，即‘仙女’在这里以换喻的形式象征了朝鲜。《阿里朗》恋歌，第一次象征了日本殖民地朝鲜

25) 《爱荷华秋深了》p154。

26) 《山洪暴发的时候》p135。

的悲哀和反抗；第二次则象征了二战後再次受到东西强权国家分割、统治的朝鲜的不幸。高丽狼曾大声疾呼：“我的全世界就是她，我的全灵魂就是她，除了她，我没有别的！”²⁷⁾这正表明‘仙女’是一个象征，是民族，祖国的象征。

《阿里朗》恋歌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于此，它还构成了划界汉人与朝鲜人的文化空隙。作者以韩语引用此歌，在文中并没有加解释，显示出这部作品的文化横断的性质。‘我’虽然很爱‘仙女’，但终无法介入高丽狼的世界，‘我最後下的判断是：“他们都是高丽人，他和她应该是一对！”²⁸⁾’我’决定离开狼，“另找一条抗日的路去”，²⁹⁾这就是十年前‘我’离开高丽狼的理由。在这里，高丽狼和‘仙女’被他者化。‘我’、小宫以及黄老人与高丽狼形成两个即有一定交流但最终不能完全勾通的空间，这样的局势也可以用“中心”与“周边”的紧张关系来表示。³⁰⁾两个空间是两个不同文化的世界，《阿里朗》恋歌表示的是在这两个文化的邻接面上存在著的不可介入的差异性的空隙。这实际上正是後殖民文学的一个特性。

後殖民文学的一个中心原理就是“要试图实现在文本中刻印出围绕现场主体性必然存在的差异性和不在性。对完全对立的两个话语，进而言之，对政治的、文化的同一化的可能性的明确化，同时也应是对横在二者之间的文化空间的轮廓的描出。而这个保持空白的空间才是做为产生差异性的场所，是後殖民文学中不可欠缺的空间。”³¹⁾这个原理在文本实践上时常反应在本土语言、对话的不加注解的直接引用上。《高丽狼》中的《阿里朗》可算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首歌确实起了一种民族志的机能，但更重要的是它以语言的距离维持了文化横断式文本的“空隙”，提示著作品的主题——差异性的表明。

高丽狼的固执於‘仙女’和固拒於‘我’和小宫的收编都强调了上面所说的差异性。‘我与高丽狼再会的时候，这个差异性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我立刻从他面孔上看出他的一种矜持，一种不真实的矜持，(中略)他那张惨白的面孔，和那双为高丽人专有的细小的眼睛，都暴露出他心理上正孕藏著非常满足的矜持。³²⁾

27) 同注14。

28) 《山洪暴发的时候》p135。

29) 同注28。

30) 参考《逆写帝国》，日语版 p.109, 引用中文笔者译。

31) 《逆写帝国》，日语版 p.100-101, 引用中文笔者译。

高丽狼的矜持表示著他的自负，这自负来自他拥有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仙女’，但同时他的矜持又拉开了他与‘我’的距离。在‘我’，高丽狼的矜持显得“不真实”，而且把“高丽人专有的细小的眼睛”与狼的矜持连在一起，明显地划界出异民族的特点，强调了‘我’与狼的差异性，‘我’不得不对狼提起一种警惕心。‘我’与高丽人‘仙女’完全隔绝，但狼与‘仙女’却是完全的一体。他正是为保护‘仙女’而拒绝任何收编的。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我’完全被摒出高丽狼的世界。

我为他如此坚强肯定的语气，吃了一惊。我们都无言，（中略）我等于刚刚发掘了他灵魂深处所埋藏的东西，他的爱竟是如此的顽固而执著，我是如此惊讶，因而为之一时莫知所措。³³⁾

‘仙女’对于高丽狼的意义正如上边所述，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而对于‘我’来说，‘仙女’只是一个美丽的高丽女人。他们“彼此无言”和“我的莫知所措”都表示著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异性和“沈默的空隙”。‘我’与高丽狼的诀别在“狼可怕的疯了”以后，“过後不久，我和老癩不得不离开了他。他的下落再知道了。”³⁴⁾这正表明‘我’在对‘仙女’的爱上，在对高丽狼的收编上都失败了。来自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导致这个结果的重要因素。新的“中心”对“周边”控制的失败，反过来说又表明了“周边”力量的抬头。

综上所述，对于《高丽狼》这篇作品，如果仍用目前主流性的观点，即朝鲜受日本帝国的统治，对他们的悲惨、他们的抵抗如何描写，作者对他们的同情和共鸣如何表现，如果只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对这篇作品是很难作准确的解读和评价的。而从後殖民文学的角度来看时，我们便可以发现作品中隐含著的後殖民文学的特质，摸索到作者试图表现的“中心”与“周边”的关系，文化横断式描写时必然要确认的存在于不同文化接触面上的差异性，以及处在周边空间的民族的主体性。当司马桑敦写作《高丽狼》时，即1950年代，当然还没有後殖民文学理论的出现，但当时东亚各国已进入後殖民时代，司马对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的关注意识已呈现出从殖民到後殖民的过渡，我们从

32) 《山洪暴发的时候》p137。

33) 《山洪暴发的时候》p145。

34) 《山洪暴发的时候》p149。

他的韩国游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高丽狼》不仅仅是对国共内战时期的描写，还暗示了50年代韩半岛的遭遇和命运。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後殖民文本的一个尝试，为我们展示了“韩人题材小说”的新天地，我们可以把《高丽狼》定位为後殖民文本性格的“韩人题材小说”。

四、從六十年代旅韓遊記看“後殖民”韓國

司馬桑敦曾經兩次訪問韓國，一次是1963年11月至12月，另一次是1964年8月間。日後他將當時寫的旅游記收進《愛荷華秋深了》中，在「寫在前面」中說：“這是一本紀錄一個人人生旅程的小集子，能向讀者提供的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真實的但不成體系的思想而已。”³⁵⁾在他的人生旅程中韓國起了怎樣的作⽤？韓國對他的“真實而成體系的思想”起了怎樣的作⽤？

司馬的遊記對韓國記述的重點可以歸納為三點：1. 韓國的風土與文化；2. 對韓戰的回顧；3. 獨立後的⺗治趨勢、民主⺗治的胎動。這三個方面實際上都反應了司馬的後殖⺑主義意識與民族主體性的認識。對於我們摸索戰後他的思想發展的軌道具有很大的意義。

(一)、高麗半島與故鄉比鄰

司馬首次訪韓的遊記一共五篇，每篇都冠著七字一行的題目，「滔滔漢江水西流」、「塔公園往事堪哀」、「靑雲閣上霓裳舞」、「戰場風腥板門店」、「尹潯善深院清秋」，可見他對這次訪韓寄予了極大的興味。

遊記開首就記述了他剛到韓國的感觸，“從空中望見漢城的時候，我意識中重新溫習起一種大陸人的感覺，真的，高麗半島上的山光水色太象北中國的大陸了”。³⁶⁾當他走下飛機時這種大陸的感覺更加強烈起來：“我意識到這純粹屬於大陸味道了，我更意識到

35) 《愛荷華秋深了》p1。

36) 《愛荷華秋深了》p133。

这是我阔别十四年第一次在「欧亚大陆岛」上登陆了。高丽半岛和我的故乡比邻，我觉得被故乡的风吹拂著了。”³⁷⁾仅仅几行文字已真实地传达了怀乡激情，告诉我们，韩国对他来说是与故乡东北相近的、唤起乡愁的土地。这种亲近感不仅来自韩国的风土、气候，还来自汉城的文化气氛和文化历史，如南阳门、雍仁宫、大汉门、国立博物馆、成均馆大学的儒学科目、汉城的中国大使馆等，都使他感受到中国文化对韩国的影响。但其他的感觉恰恰与他所看到的韩国的现实形成时代倒错性的对照。

当一位韩国朋友向他介绍了韩国被中国、日本奴役的历史，说“如今，我们还是受人支配：一半属于俄国，一半属于美国！”³⁸⁾时，司马深切地感叹道：“从历史角度来理解一个民族心理的形成的话，他的想法未始不应予以同情的。”³⁹⁾他首先意识到“目前这个正向民族独立迈步的韩国”，“第一步工作则是要设尽方法来冲洗中华的色彩”，⁴⁰⁾即禁用汉字。对于这一点，司马并不赞成，因为汉字的禁用与他所感受的汉城的气氛颇有隔绝。他指出：“纵然这步工作，未必对于他们的独立文化有建设，有效果，但，只要对于他们民族的信心有帮助，他们还是要硬干下去的。老实说，忍受落后，宁开倒车，几乎是现代新兴国家民族主义思潮中最普遍的一个倾向，你不能责备他们，可也不能太称赞他们。”⁴¹⁾帝国的殖民地统治与语言控制有著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语言的统治体现了压抑殖民地的最重要的特质。二战前所有亚非及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韩国从古代就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统治，语言表达均用汉字。1910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後，又改用日语。汉字、日语长期以来牵制了他们的民族自信。所以独立後他们第一步要作的就是文字的转换。司马桑敦在汉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时他的意识中不能没有台湾，从日文转向中文，在当时的台湾可谓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向，同时这又是所有殖民地国家独立後必经的文化独立的道路。实际上这也是後殖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司马把韩国的文字政策看做“忍受落后，宁开倒车”的现象，这可以说是对战后韩国的较刻薄的评价。但他以新兴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普遍现象来看待这个问题，客观地承认这样的文化转向的必然性，承认文化转向与民族主体性的内在关系，把它看成是由被殖民到真正独立的过渡期中的一个文化现象。这证明他在从殖民到後殖

37) 《爱荷华秋深了》p134。

38) 《爱荷华秋深了》p136。

39) 同注38。

40) 《爱荷华秋深了》p137。

41) 《爱荷华秋深了》p137

民过渡的过程中，已开始以文化横断式的多元视野，来认识文化转向与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关系。

(二)、回顾韩战

司马在游记中几次提到韩战。在他第一次看到汉江时，就立刻联想起1950年的那场战争，他说：“看到了旧桥桥基才让我感到十二年前那场残酷的战争。我又重新回忆起那幅可怕的图画：破坏了的汉江大桥上面，挂满了成千上万受难的韩国人民。在当时，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自由，唯一的寄托就在这座受伤了的桥了。”⁴²⁾韩战时司马在台湾，但他对这场战争曾非常关注。访韩中，他特地去了板门店，观察了这个军事共管区的情形，自由桥、士兵住宅、不归桥、会议室等等。1962年以后板门店已成了旅行观光点，每年都有大批的东西双方的游客来参观，司马在游记中写道：“这些参观的人是来找和平的象征或是冷战的标本？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就我自己来说，则是肯定了后者。”⁴³⁾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这里是苏联和美国两大强权对峙的象征。

司马在第二次访韩时，特地去了釜山，参谒了联军战士公墓，釜山是司马早就向往一看的历史名城，那是因为釜山在韩战时曾经成为联军和韩军的最後一个堡垒，在这里战死的联军兵士达一万四千多人。他特别提到了土耳其士兵的英勇，在公墓里，他看到了土耳其士兵的坟墓，他写道：“墓上插著土耳其国旗上弯月和星的标识，整齐的一面，排列的很远。这整齐排列著的墓标，现在看来颇为壮观，但，若想起当年血肉模糊的一面，却未免令人不胜唏嘘了。(中略) 我想，这个国家的人民真正自由的日子虽尚远，但，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英雄已为这自由付出很大的代价了。”⁴⁴⁾

司马桑敦之所以如此重视韩战，自然与当时台湾在国际关系上的处境以及整个亚洲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司马以政治记者的意识，必然要深切洞察大局和其中几个关键国家的命运。韩国做为东西冷战的标本不能不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不能否认，在司马的意识中有对共产社会的反感，但实际上他所追求的自由世界并不等于认同美国的支配。苏美对韩半岛的控制无疑是在政治、军事上对韩半岛的再统治，所以司马说“这个国家的人

42) 同上 p135。

43) 同注42。

44) 《爱荷华秋深了》p198。

民真正自由的日子尚远”，⁴⁵⁾他所说的“这个国家”不仅指韩国，还泛指整个韩半岛。他寄予韩半岛的希望是民族自身的主体性的独立和自由。

(三)、对韩国政局与学生运动的关注

司马的两次访韩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第一次是应韩国军人执政团邀请，为观察军人执政团革命後第一次民主选举访韩的。第二次则是台湾张群特使随行记者身分。因此他的游记中触及到韩国政局的内容就比较多，可以说这是他主要的公务。但除了这样的公务以外，他还准备了他自己的目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韩国知识人、学生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了解。比如，第一次访韩时，他去了塔公园，那是1960年4月韩国学生反对李承晚政权的民主运动的发源地，又称“四月学生革命”，这次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的独裁政府，使韩国向民主主义社会迈进了一步。继而发生的朴正熙的军事政变是承了学生运动胜利之风一拥而冲上政坛的。司马介绍说：“这场革命，完全由学生发动的，学生大都是赤手空拳未使用一枪一弹而获得成功，这是值得特别一书的。（中略）朴正熙一班人也自称他们的军事革命只是学生革命的延长，可见这个运动的精神在韩国政治上是具有相当分量的。”⁴⁶⁾司马在分析李承晚独裁政治及後来的军政独裁的朴正熙政治时，总是将韩国知识分子、学生的民主精神放在与政府对峙的位置，以对照的形式来批判独裁政治。

司马在第二次访韩时更加关注了学生运动，因为当时日韩之间正在进行著日韩条约协商会议，朴正熙为了争取日本的贷款，在战争责任问题和经济协助上都大幅度地迎合了日本政府。对此韩国人民纷纷起来抗议，3月27日汉城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到5月20日游行活动扩展到全部汉城，学生与警方开始发生冲突。6月间朴正熙宣布非常戒严令，8月政府通过了两个法案，即「学园保护法」和「言论伦理法」。这两个法案马上又激起了更大范围的国民的反对。司马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再次访韩的。所以他一到汉城就开始采访学生、教师和媒体人员，极力想了解运动的内情。他从一位汉城大学教授那里了解到韩国学生运动与韩国民族独立运动有著密切的关系，它继承了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的传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中不断发展，已成为韩国知识分子反抗专制统治的传统，并肯定1964年5月的学生运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运动。朴正熙政府对

45) 同上。

46) 同上 p147。

学生运动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很引起了司马的注意，他在游记中写道：“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以学生革命之延长自居的革命领导人，居然下令占领了学生起居的校园。这次戒严令，虽然7月25日便又解除，韩国知识分子对朴正熙枪杆子政权的印象加深了。韩国士大夫的反抗传统是不太容易和这种抢干当局融洽长久的。”⁴⁷⁾在朴正熙当权不久的时候，司马已洞察到他的独裁统治的危险和必将被推翻的命运，他的洞察可谓十分尖锐和先见。

在两次访韩中司马还作了另外一个公务以外的工作，那就是对韩国政治家内面与反面的了解。第一次访韩时他冒了大家的反对，访问了朴正熙政治对手尹潽善。访问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寻出一些韩国政治上的特殊感觉和特殊气氛。”⁴⁸⁾尹潽善在1919年曾流亡上海，参与了在上海组织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司马对他的重视在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上，司马写道：“尹先生就是在伦敦感染了一身民主政治的空气，他希望他的祖国能够逐渐走上民主政治的光明大道。也就因此，1961年3月22日，当军人执政团颁布一道「政治活动净化法」，企图限制民主政治中最重要政党的自由活动时，他便毅然由总统位置上辞职了。他是由权力宝座上走下来以反对军人执政团的独裁措置的。”⁴⁹⁾尹潽善在1963年的总统大选时虽然没能当选，但他对朴正熙政治的批判却是本著民主主义思想的，司马对尹潽善的政治态度是肯定的，同时也通过尹潽善的辞职指责了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弊病。

司马的第一次访韩是为了观察韩国军人执政团自称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但他却更多地注意到了即将当选为大总统的朴正熙的反民主的一面。比如游记中触及到「政治活动净化法」，尹潽善的辞职，就是一个例子。他还提出一些资料指责“军政府提高了间接的消费税和减低直接税，是利於资本家而不利於农民，以及去年改革币制时的失败，使得广大人民的生活更趨於痛苦”。⁵⁰⁾因为军政府的这些措施的失败，在大总统选举时朴正熙的政敌尹潽善以454万余票紧逼朴正熙，对此司马指出：“这说明军政府两年半来的政绩并未获得人民普遍的支持。”⁵¹⁾第二次访韩时他更关注了韩国人民对朴正熙政府颁布的几个法令的反抗，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反对日韩条约协商的学生运动外，他还介绍了韩

47) 《爱荷华秋深了》p191~p192。

48) 同上 p164。

49) 同上 p164。

50) 同上 p150。

51) 同上 p152。

国媒体界反对「言论伦理法」的情况，提到韩国公报部部长李寿荣的辞职，他介绍了一个韩国评论家的意见：“韩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便是反抗现实与批评现实的。（中略）执政者想要剥夺韩国人这种自由，是不智的，也是危险的。”⁵²⁾司马通过介绍这些韩国知识分子的意見，来反映他自己对他们的民主运动的赞同。

通过两次访韩他已对韩国的社会与政治局势有了一个较深刻的认识。如何面对民众的民主自由的要求？如何打开韩国经济上的困局？如何争取美日的经济援助？这些是当时朴正熙政权面临的重要问题。必然要给日後的韩国带来巨大的风雨动乱。司马说：“朴正熙在这风雨中怎样走法？走向哪里？老实说，这都是关系著整个亚洲的前途的！”⁵³⁾他已预料到了将要来临的长达32年的军人统治和韩国民众百折不挠的民主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他把韩国的问题看成整个亚洲的问题，自然也抱阔台湾，即做为东西冷战标本的韩国，今後该怎样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化，正以正反两面的现实成为亚洲各国的标本。在警惕韩国军人独裁政治的时候，司马必然会意识到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治，早在1949年就进入戒严状态的台湾，政治、社会各方面都与韩国十分相近。司马如此重视韩国，与他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的认识有密切的关联，或许他意图以介绍和论述韩国的现状来暗示他对台湾独裁政治的危机感与批判。

五、司馬桑敦的韓國敘述的當今意義

通过以上分析证明韩半岛与司马桑敦的文学和思想都有著密切的关联。从抗日时期到韩战，再到60年代，司马都一直关注著韩半岛。这段历史自然是亚洲各殖民地国家从被殖民走向独立的历史，也是在经济、文化上向後殖民过渡的过程。帝国中心的崩溃带来周边国家的兴起，这些周边国家在重建自己的主体性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种种难关，一方面要与新兴霸权抗争，另一方面又要清洗和反利用依然存在的帝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和台湾都可算是亚洲最典型的标本，60年代他们都是东西冷战的重要交点，因此司马对韩国的重视完全基于现实的需要。他的《高丽狼》和韩国游记都是他摸索周边

52) 《爱荷华秋深了》p183。

53) 同上 p192。

国家在後殖民状态下如何表现自己的主体性的尝试。其中有对文化横断中的差异性的认识，如《高丽狼》；也有表示「他山之石」意图的，如，韩国游记。但做为这些书写尝试的思想基础应是民主主义思想。今天，韩国和台湾都突破了政治独裁统治，走上民主主义大道，然而南北分断、两岸隔绝的状态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都证明了司马当年的预见是正确的，他提示的课题一半已完成，另一半还需努力。在50年代、60年代，司马就以後殖民的观点及多元文化视角观察和书写了韩国，他的观点和视野对今天我们的多元性文化认识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

参考书目

- 司马桑敦,《山洪暴发的时候》,爱眉文艺出版社,1960年。
司马桑敦,《爱荷华秋深了》,尔雅出版社,1977年。
司马桑敦,《野马传》,文星书店,1967年。
《自由中国》
宫冢利雄,《阿里朗的诞生》,创智社,1995年。
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武田幸男编,《朝鲜史》,山川出版社,1996年。
池明观,《韩国 通往民主的路》,岩波新书,1995年。
陈芳明,《後殖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年。
陈芳明,「百年来台湾文学与台湾风格」,《中外文学》第23卷9期 1995年。
木村茂雄译,《後殖民文学》,(《The Empire Writes Back》),日语本版 青土社,1998年。
赛义德,大桥洋一译,《知识分子论》,平凡社,1995年。

<Abstract>

Taiwan Writer Simasangdun(司馬桑敦)'s Korea description

Rina Fujita

Simasangdun includes to Taiwan literature history. But, he roved missing the native place with 'Outside'. had some life base: China northeast area, Taiwa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rough this, we can know truth of 'Driving out and wandering are eternal subject of Taiwan literature'. Simasangdun's literary subject is consisted of driving out and wandering mainly. Life site that change makes him contact the different nation, different language, different culture, made his reason richly.

Key words Taiwan literature, Simasangdun, Driving out, wandering

투 고 일 : 2007년 9월 10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2월 15일
